

经贸整合、利益认知与政治立场： 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动态分析 (2004—2016)

陈玮¹ 耿曙²

(1.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2.浙江大学 社会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两岸经贸全面开放迄今已历十载,对国家统一而言,此政策承载着赢取台湾民心的重任。那么,台湾地区民众两岸经贸态度如何,又经历哪些变化?本文在扩宽时间纵轴后发现,他们的两岸经贸态度曾经历剧烈起伏——从早先的热烈期待,到中期的不安质疑,再恢复至近期的友好欢迎。在两岸经贸格局、台湾经济社会结构均未明显变化的背景下,是什么导致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巨大变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针对台湾地区4轮平行民调(2004、2008、2012、2016年)展开分析,发现影响台湾民众态度的因素存在明显的阶段差异:在开放交流之前与初期,认同因素主导民众的经贸态度,随着两岸交流扩大,阶级因素的影响越发重要。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由于承受能力较差,相对剥夺感较强,台湾社会底层民众对两岸经贸的反应更加强烈,立场更为鲜明。从上述发现来看,民众通过感受经贸交流对切身利益的影响,然后形成政治态度。换言之,是主观感受,而非客观利益,左右了台湾民众的政策立场。本研究一方面追踪台湾政治如何从“认同政治”转向“阶级政治”,另一方面也以两岸经贸互动为案例,厘清“经济”与“政治”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关键词: 政治经济; 两岸关系; 阶级政治; 认同政治; 利益认知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2-001-12

DOI:10.14157/j.cnki.twrq.2019.02.001

一、如何理解起伏震荡的台湾民意?

自2008年两岸经贸全面开放,迄今已历十载。对国家统一而言,此政策承载着赢取台湾民心的重任。两岸都期盼通过紧密的经贸交流,实现互利互惠,拉近双方的政治距离,消弭政治差异。一方面,大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期望通过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另一方面,台湾方面马英九当局,因回应台湾民众的诉求,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然而,随着两岸经贸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记忆研究”(18ZDA159)子课题“台湾中华民族认同民意调查分析与资料库建立”

作者简介:陈玮,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耿曙,男,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研究员。

* 本文初稿曾宣读于“首届两岸治理研究工作坊”,作者感谢工作坊组织者陈超老师、郑振清老师及与会老师的指导。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美国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台湾政治大学陈陆辉教授不吝分享之调查数据,陈老师并在观点上多有提示,作者对此深表谢意。

流的扩大,却逐渐萌生质疑与不安。2014年3月,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或称“反服贸事件”),上万学生与民众上街游行,甚至强占“立法院”,抗议其审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这一运动对两岸关系影响深远:一方面,旨在进一步推动开放的服贸协定自此搁浅;另一方面,两岸经济社会互动陷入僵局,交流形势急转直下,迄今尚未恢复。

纵观过往十余载的台湾民意变化可以发现,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交流的态度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根据相关民调数据(如表1),质疑两岸经贸开放的民众在2008年达到低谷,只有略高于两成(22%)的民众主张两岸应该紧缩开放交流;然而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骤然上升到35.81%。为何短短4年时间,台湾民意就从普遍欢迎经贸开放,迅速滑向疑虑,甚至因此引发2014年的抗议事件?更何况,这一切变化都在两岸经贸格局、台湾经济社会结构均未发生剧变的情况下产生,不免让人困惑不解。

表1 2004、2008、2012、2016各年度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开放的态度

单位:%,个

态度	时间	2004 占比(案例数)	2008 占比(案例数)	2012 占比(案例数)	2016 占比(案例数)
降低两岸经贸		28.23(419)	22.31(240)	35.81(385)	20.22(216)
无明显立场		24.20(359)	21.79(234)	22.83(245)	24.64(263)
加强两岸经贸		47.57(706)	55.90(602)	41.36(445)	55.14(590)
总观察值		1 484	1 076	1 075	1 069

数据来源“两岸关系和国家安全民意调查”(2004、2008、2012),主持人:牛铭实, <https://sites.duke.edu/pass/data/>;“人格特质与政治态度和参与调查”(2016),主持人:蔡佳泓。

为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本文希望找出影响台湾民众两岸政策态度的因素。在有关民意变化的研究中,主流方法往往从结构视角考察“经济”对“政治”的影响。^[2]显然,传统政治经济范式似乎对台湾波动的民意缺乏解释力。针对现有范式不足,本文利用4轮台湾地区平行民调(2004、2008、2012、2016年)进行分析,捕捉影响台湾民众政治立场的历时变化及其原因。研究发现,首先,影响台湾民众两岸经贸立场的因素,显现出清晰的阶段差异:2004—2016年间,左右台湾民众两岸经贸立场的主要力量,已经从早期的认同因素,逐步转变为阶级因素;其次,联结经贸交流与政治立场的是民众对切身利害的感受,而后者并非由经济与社会结构所决定。本文发现,台湾民众主要是依据主观认知,而非实际利害,形成政治立场。更进一步,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经贸的立场,更多取决于其所认知的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也即民众更关切所处的相对社会地位。换言之,社会地位的变化影响他们的公平认知,并最终形成他们的政治回应。

基于上述目标,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将简要回顾解释台湾民众政治态度的理论框架,尤其侧重近年在两岸经贸立场居于主流的“理性与感性”框架,并且从该框架的“利益认知”角度延伸切入,探讨在经济交流的结构之下,民众认知利益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其政治立场,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节在前文基础上进行模型设定与数据介绍;第四节进行模型检测,逐一分析各阶段影响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整合立场的决定因素,并与理论假说进行参照与讨论;第五节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及其理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后续研究方向。

二、利害与爱恨交织的两岸经贸整合:认同、利益与阶级

针对台湾民意与投票行为的研究,早期(1990年代直至2000年初)的研究发现,受到政治转型的影响,民粹倾向明显,认同政治突出。^[3]进入21世纪后的研究,则逐步基于利益考量的层面。^[4]换言之,左右台湾选民政治态度与投票行为的因素,徘徊于“认同”与“利益”两大影响层面。

在此基础上, 来自吴乃德、耿曙、陈陆辉等学者提出的“理性 vs. 感性”框架成为解释台湾民意最具代表性的理论。^[5] 该框架将“认同”与“利益”同时纳入, 考察两者的彼此消长以及台湾民众对两岸议题的态度, 甚至台湾政治的深层变化。其所谓“感性因素”一般包括: (1) 身份认同, (2) “统独”立场, 或者 (3) 原生的省籍身份等。其“理性因素”则包括: (1) 所属产业部门, (2) 个人竞争优势, 或者 (3) 地区因素等。就近期的两岸研究观察, “理性 vs. 感性”已经成为考察台湾民众两岸议题态度最重要的分析框架。^[6]

随着理性因素的脉络, 台湾民意在 2008 年后又出现了新的动态。阶级因素对台湾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根据部分学者的观察,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 台湾经济持续低迷,^[7] 导致民众的阶级意识崛起, 极为关注财富再分配。^[8] 阶级越来越成为台湾政治的重要议题, 也成为近年台湾社会运动的结构基础。不过以往的研究多基于观察, 而缺乏严格的经验验证。因此, 作者基于上述文献基础, 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随着两岸经贸持续推进, 阶级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会影响台湾民众的两岸经贸态度。

但是, 不论传统的感性因素或者理性因素, 还是新近的阶级因素, 都属于影响民众个体的“结构力量”, 在解释台湾民意动态上往往力有不逮。由于结构不会短期遽变, 相对稳定的结构力量便难以充分而细致地解释变化多端的民意动态。表 1 所显示的台湾民意——在短短的 12 年间, 民众对两岸经贸整合的态度经历两次起伏, 震荡率达到 15% 左右——但是基于既有理论的各类结构力量却未呈现出如此剧烈的波动, 与两岸经贸紧密相关的“统独”立场并未见比较明显的波动(如图 1), 两岸整体经贸格局也未出现大幅转变(如图 2)。虽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2009 年两岸经贸交易额锐减, 但之后迅速上升, 并稳定在高位。根据学者测算, 两岸经贸中台湾的收益水平不断提高, 并未出现大幅波动。^[9] 而台湾的经济社会结构, 亦未显现巨大的贫富分化差异(如图 3), 2004 年以后, 台湾地区家户收入五等分最高所得 20% 家庭相对于其他组家庭所得的倍数一直呈现平稳趋势。综上, 依据结构力量难以充分、细致地解释台湾民众对两岸整合态度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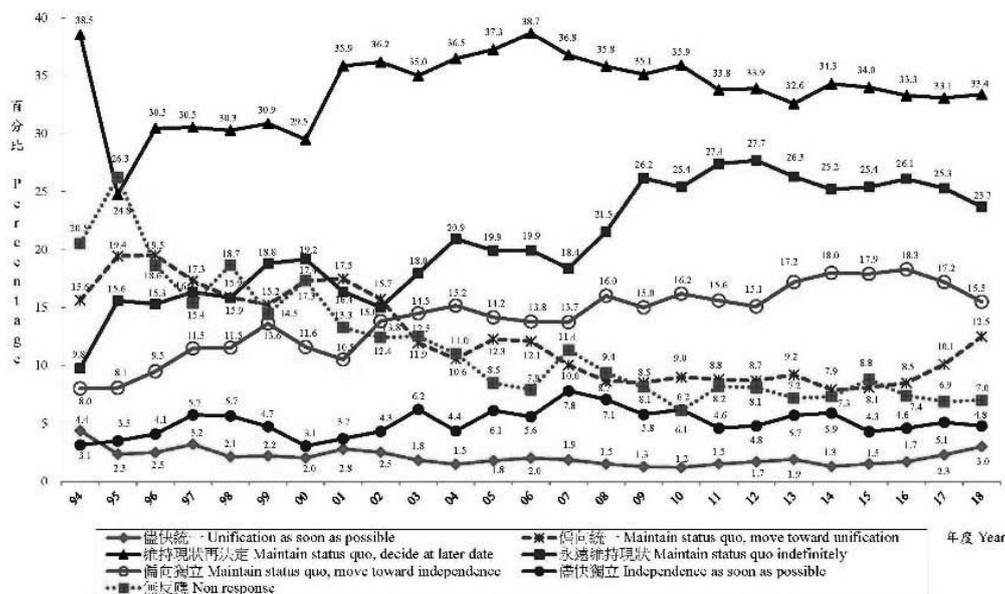


图 1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图(1994—2018.6)

资料来源: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https://esc.nccu.edu.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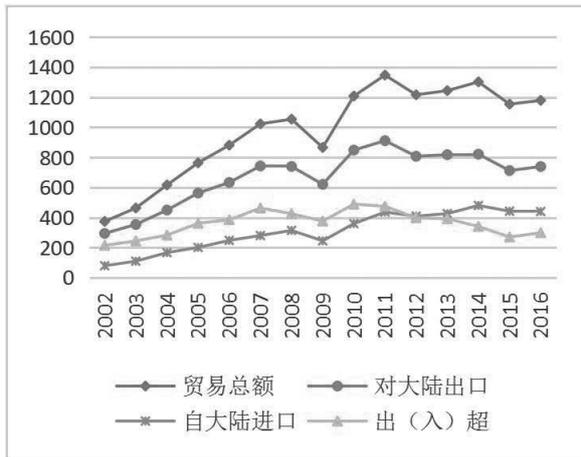


图2 2002—2016年两岸经贸主要指标(亿美元)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https://www.mac.gov.tw> 2017年9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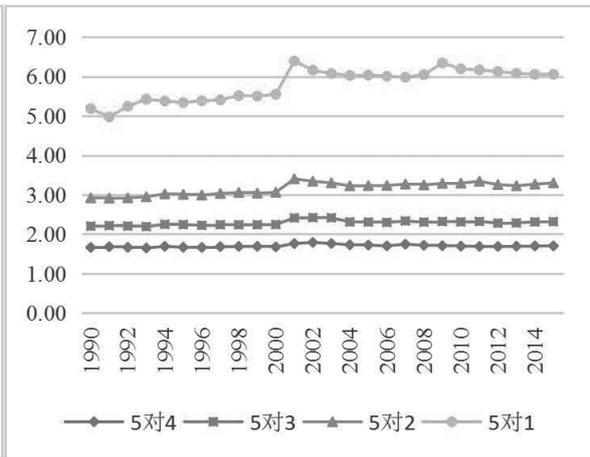


图3 1990—2015年台湾家户收入五等分最高所得20%与其他组别的倍数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行政院”主计处《104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台北“行政院”主计处2016年10月。

鉴于上述缺陷,本文希望通过研究思路上的创新,尝试解释为何涉及两岸经贸整合议题时,台湾民众的立场会出现大幅波动。在前述“理性 vs. 感性”框架中,民众的政治立场,是民众在经济利得与认同得失之间权衡的结果。例如一个认同上偏向“独立”的台湾企业家,可能既能从两岸交流中获利,又感受到两岸趋统的压力。那么,当事人此时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形成一个可以说服自己与他人的政治立场。

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民众对经贸整合带来的“利害得失是什么”的判断,未必与经贸带来的客观利得相一致。因为当事人据以形成政治立场的“经济利得”,其实是经过信息过滤、社会诠释之后所形成的“利益认知”。换言之,台湾民众的政治立场,并不取决于客观分析的“实质利益”,而是受制于当事人感受的“认知利益”。^[10]从这个角度看,连接“两岸经济交流”与“民众政治态度”的利益因素其实相当复杂。所以,即便经济结构维持稳定,由于利益认知发生变化,民众的政治态度与政策立场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既有研究发现,台湾民众在判断两岸经贸对台湾整体的“集体利益得失”的过程中,会受到个人的意识形态(认同偏好)、接收媒体(过滤信息)和所处网络(二手传播/社会诠释)等因素的建构,而这些因素又会在认知过程中不断波动与变化。由此可见,利益认知是复杂且动态的过程。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说:阶级利益对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影响,并非源自民众所在阶级的客观得失,而是源自该群体民众的得失感受。^[11]

综上,学界无法掌握民意震荡起伏的根本原因,正是对利益因素过于简化与固化的理解。因此,需要对利益因素进行多元和动态的分析,特别是动态的利益感受。有鉴于此,作者将在下一节选取台湾的4轮平行民调(2004、2008、2012、2016年)进行对照考察,一方面分析前后阶段影响民众两岸经贸立场的因素,以及各阶段因素为何不同,另一方面也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与讨论。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基于前文的思路,本文必须通过“纵贯数据”方能捕捉台湾民众政治态度的动态变迁。本节对4轮平行民调数据(问卷主要问题几乎完全一致)进行介绍,重点在:(1)划分两岸经贸发展历程的四个阶段:开放之前(2004)、开放之初(2008)、全面开放(2012)、转向紧缩(2016),先分阶段考察,

再联系对照进行解读; (2) 变量“两岸经贸开放态度”与解释变量“阶级因素”“认同因素”“理性因素”的捕捉与度量。

(一)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思路, 本文的解释架构如下: 首先是基础模型(benchmark model) 的设定, 主要根据前述“理性 vs. 感性”框架进行初步设定。其中理性层面与自我利益相关, 代表竞争能力的“受教育程度”, “经济区域”与“产业部门”都是考察重点; 另一方面, 感性层面与民众的意识形态有关, 其中代表台湾人“族群认同”的省籍背景、困扰台湾民众多年的“台湾人-中国人”“身份认同”、代表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看法的“统独立场”以及政治倾向的“政党认同”都是考察重点。

本文选择 4 个时间作为考察节点: (1) 开放之前, 以 2004 年调查代表, (2) 开放之初, 以 2008 年调查代表, (3) 全面开放, 以 2012 年调查代表, (4) 转向紧缩, 以 2016 年调查代表。2004 年之前, 历经李登辉的“戒急用忍”, 陈水扁的“泛绿执政”, 两岸经贸处于紧缩与封闭状态, 两岸交流仅限货物间接贸易以及部分台商来大陆的投资活动。之后, 经过接触沟通, 开辟“国共经贸论坛”等管道, 终于到 2008 年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 两岸交流大门自此大开。此后, 台湾在经贸与交通运输领域逐步放开限制, 两岸经贸交流进入全盛时期, 促成交通旅行的“三通”、签订了两岸经贸框架协议(ECFA), 陆续开放了货币兑换、金融合作、产业投资以及社会领域的交流。2012 年可以算是两岸开放的全盛期, 并且有继续开放扩张的美好愿景。但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 针对两岸经贸的质疑声也逐渐增加, 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开放与执政党国民党的不满与日俱增。到了 2014 年上述不满以“反服贸”为名的“太阳花”学运表现出来。再到 2016 年, 随着台湾政治版图的蓝绿消长, 民进党重新执政, 两岸关系急转而下, 该年可以视为两岸经贸转向紧缩的分水岭。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针对上述阶段划分, 本文所用数据由 4 轮平行民调数据合并而成。2004、2008、2012 三年的数据来自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主持的“两岸关系和国家安全民意调查”系列, 2016 年数据来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蔡佳泓研究员主持的“人格特质与政治态度和参与”项目。^[12] 该 4 轮平行调查虽非全部问题完全一致, 但主要变量均完整涵括度量, 同时各个调查均由政治大学选研中心执行, 数据搜集采用相同抽样方法, 皆能充分反映台湾社会情况, 性别、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和省籍的客观人口变量分布比例接近, 因此可以平行比较。^[13]

在变量设定方面, 除非另有需要, 否则原则参照之前学者相关研究。具体设定简要报告如下: 本文考察的被解释变量是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开放的态度。在具体测量时, 从“两岸关系和国家安全民意调查”中选择的问题是“有人认为台湾应该加强与大陆的经贸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台湾的经济成长; 也有人认为台湾应该降低与大陆的经贸关系, 不然会影响台湾的安全。请问您比较同意哪一种观点?”; 从“人格特质与政治态度和参与”中选择的问题是“请问您认为政府对两岸经贸交流的政策, 应该比现在更加开放还是更加管制?” 在处理变量时, 将同意“管制两岸经贸开放”设为 1, 将同意“加强两岸经贸开放”与“无明确态度”的选项合并设为 0, 作为参照组。至于最主要的解释变量“阶级”, 根据 4 轮平行问卷中的 9 大类职业类别(主管人员、专业人员、佐理人员、服务人员、农林渔牧、劳工、学生、军警、家管) 35 小类职业划分出高、中、低三个阶级(如表 2)。

表 2 自变量“阶级”的划分方式

变量类别	划分方式
高阶	101 民代, 102 政府行政主管, 103 公营事业主管, 104 民营事业主管, 105 民营事业公司负责人(自营商人)、有雇用人, 106 民营事业公司负责人(自营商人)、没有雇用人, 201 政府部门研究人员(科学家), 202 私人部门研究人员(科学家), 203 公立医疗单位医事技术人员, 204 非公立医疗单位医事技术人员, 205 会计师, 206 公立教育机构教师, 208 法官、书记官、检察官、司法官, 209 律师

续表	
变量类别	划分方式
中阶	207 私立教育机构教师 ,210 宗教工作者 ,211 艺术工作者 ,212 文字工作者 ,213 公益事业工程师(机师) ,214 民营事业工程师(机师) ,215 职业运动专业人士 ,301 政府单位与公益事业部门职员 ,302 民营事业职员 ,303 买卖业务人员 ,801 军警调查局人员 ,901 家管、没有做家庭代工 ,903 家里有事业、有帮忙但未领薪水 ,904 家里有事业、有帮忙且领薪水
低阶	401 服务、餐旅人员 ,501 农林渔牧 ,601 政府单位与公益事业部门劳工 ,602 民营事业劳工 ,701 学生 ,902 家管、有做家庭代工 ,905 失业者 ,906 退休者

四、经贸开放过程中的态度变化: 各阶段影响民众两岸经贸立场的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设计与变量度量,本节以四个阶段划分,分别就民调数据进行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的检测,并对检测结果列表进行前后比较与分析诠释。本节重点在(1)寻找两岸经贸整合进程中影响民众政治态度的因素变化;(2)针对民众的“利益认知”与“态度形成”进行考察,尝试挖掘其中的机制,帮助掌握政治态度与立场的动态。

(一) 各阶段影响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因素

上述4个阶段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整理如表3和表4。首先,根据表中“模型2004-1”和“模型2004-2”结果所示,^[14]处于两岸经贸尚未全面开放的2004年,影响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主要因素为认同因素,阶级因素此时尚未产生实质影响。认同层面因素中,“统独”立场、身份认同、政党支持均对台湾民众的两岸经贸态度产生了影响。传统理性层面因素中,产业部门(表4)与经济区域的作用均不显著,代表能力高低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民众的经贸政策立场。由此可见,在2004年,认同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

其次,“模型2008-1”和“模型2008-2”展示的是2008年影响台湾民众两岸经贸开放态度的结果。在这一时期,认同因素、利益因素仍然发挥部分作用,而阶级因素已经显露出独立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相对于中阶的人群,高阶民众选择管制两岸经贸立场是其他立场的0.605倍 $[\exp(-0.503)]$,说明他们更支持两岸经贸开放,反对两岸经贸管制。低阶民众此时态度尚不显著。在认同因素中,“统独”立场与政党支持的作用依然显著,且方向与系数和2004年类似,但身份认同这一变量不再显著。理性层面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区域作用显著,产业部门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再次,“模型2012-1”和“模型2012-2”展示的是两岸经贸开放全盛时期的结果。此时,认同因素作用仍然强大,传统的理性层面因素不再有作用,阶级作为独立因素的作用仍然显著,但是起作用的群体与2008年已截然不同。之前对两岸经贸支持立场的高阶群众不再有强烈的态度,而是相对冷感;与此同时,低阶民众则表现出明显的反对经贸开放的立场。根据表3数据显示,相对于中阶群体,低阶民众持管制两岸经贸立场的是其他立场的1.567倍 $[\exp(0.449)]$ 。认同因素中,“统独”立场、身份认同、省籍背景、政党支持全部表现出对民众经贸态度的显著作用。表4结果也显示,利益因素中的产业部门、受教育程度、经济区域的作用均不显著。

最后,2016年的结果如表中的“模型2016-1”和“模型2016-2”所示。到2016年,换党执政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两岸经贸即将进入紧缩时期。此时,认同因素仍然部分保持显著,传统的利益因素持续无作用,阶级作为独立因素继续显著影响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开放政策的态度。与2012年类似,相对于中阶民众,低阶民众继续反对两岸经贸开放,持管制两岸经贸立场的概率是持其他立场的1.458倍 $[\exp(0.377)]$,而高阶群体继续对两岸经贸政策冷感。认同因素中,“统独”立场与身份认同的作用仍然显著,但是省籍背景与政党立场不再对民众两岸经贸立场产生作用。利益因素中,产业部门、受教育程度、经济区域持续无作用。综合上述,2016年的结果与2012年颇为类

似, 认同因素与阶级因素都表现出显著的作用效果。

综合上述各阶段模型检测结果, 不难发现其变化趋势: 2004—2016 年间, “统独”立场、身份认同、省籍背景、政党立场等认同因素的作用在不同阶段均有所波动, 不过目前仍然能够影响民众的经贸立场; 产业部门、受教育程度、经济地区这些传统的利益因素, 早期尚能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 后期则已经失去影响力; 阶级因素从 2008 年开始即展现出对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影响力, 并且其有感群体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变化, 高阶民众从强烈支持经贸开放到持续无感, 而低阶民众持续倾向管制两岸经贸。由此可见, 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的政治立场, 逐渐从早期的“认同挂帅”演变为“认同”“阶级”并重, 这意味着台湾政治的核心已经从“认同政治”逐渐走向“阶级政治”, 本文的第一个假说因此得到验证。

表 3 经贸开放各阶段影响民众两岸经贸立场因素的 Logit 模型分析(2004—2016)

	2004-1		2008-1		2012-1		2016-1	
	Exp(β)	S.E.						
阶级(中阶=0)								
高阶	0.931	(-0.37)	0.605*	(-1.82)	1.089	(0.38)	1.506	(1.63)
低阶	0.810	(-1.22)	1.119	(0.52)	1.567**	(2.39)	1.458*	(1.69)
“统独”(维持现状=0)								
统一	1.033	(0.15)	0.816	(-0.63)	0.773	(-0.92)	0.923	(-0.26)
“独立”	2.073***	(4.34)	2.762***	(4.86)	1.713***	(2.94)	2.375***	(4.37)
身份(中国人及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0)								
台湾人	1.342*	(1.94)	1.350	(1.49)	1.898***	(3.78)	1.722**	(2.52)
省籍(客家人=0)								
闽南人	1.371	(1.49)	0.658	(-1.53)	1.049	(0.20)	1.627	(1.59)
外省人	0.817	(-0.66)	0.582	(-1.37)	0.449**	(-2.11)	0.818	(-0.44)
政党(无倾向=0)								
泛蓝	1.030	(0.17)	0.834	(-0.77)	0.617**	(-2.48)	0.859	(-0.61)
泛绿	1.473**	(2.22)	3.665***	(5.54)	2.908***	(5.71)	1.276	(1.18)
教育(高中=0)								
初中及以下	1.649***	(2.88)	1.303	(1.18)	1.220	(0.92)	0.931	(-0.27)
专科及以上	0.692**	(-2.10)	0.545***	(-2.66)	0.892	(-0.60)	0.982	(-0.09)
地区(中部=0)								
北部	0.876	(-0.73)	1.309	(1.03)	1.371	(1.45)	0.758	(-1.14)
南部	0.982	(-0.10)	1.144	(0.49)	1.111	(0.47)	0.945	(-0.23)
东部	0.621	(-1.28)	2.117*	(1.80)	1.230	(0.49)	1.594	(1.17)
世代(60岁以上=0)								
20-25	1.693*	(1.86)	1.123	(0.30)	0.642	(-1.33)	0.899	(-0.28)
26-59	1.382	(1.43)	1.217	(0.73)	1.149	(0.59)	1.020	(0.07)
性别(男性=0)								
女性	1.048	(0.32)	1.045	(0.22)	1.090	(0.53)	1.102	(0.52)
<i>N</i>	1259		958		933		895	
<i>Log Likelihood</i>	-674.834		-416.468		-509.744		-411.818	
<i>df</i>	17		17		17		17	
<i>AIC</i>	1.101		0.907		1.131		0.960	
<i>Pseudo R</i> ²	0.0767		0.1803		0.1580		0.0875	

说明: 因变量: 0=加强两岸经贸开放/无具体立场; 1=管制两岸经贸开放。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数据来源: 同表 1。

表4 经贸开放各阶段影响民众两岸经贸立场因素的Logit模型分析(2004-2016)(未含“阶级因素”)

	2004-2		2008-2		2012-2		2016-2	
	Exp(β)	S.E.						
“统独”(维持现状=0)								
统一	1.043	(0.20)	0.814	(-0.64)	0.794	(-0.82)	0.930	(-0.24)
“独立”	2.062***	(4.31)	2.741***	(4.85)	1.687***	(2.85)	2.335***	(4.30)
身份(中国人及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0)								
台湾人	1.337*	(1.91)	1.372	(1.58)	1.881***	(3.72)	1.758***	(2.62)
省籍(客家人=0)								
闽南人	1.395	(1.57)	0.657	(-1.55)	1.034	(0.14)	1.595	(1.53)
外省人	0.834	(-0.59)	0.592	(-1.33)	0.445**	(-2.13)	0.832	(-0.40)
政党(无倾向=0)								
泛蓝	1.029	(0.16)	0.830	(-0.79)	0.621**	(-2.44)	0.845	(-0.67)
泛绿	1.470**	(2.22)	3.553***	(5.45)	2.873***	(5.64)	1.266	(1.14)
产业部门(无关=0)								
受益	1.055	(0.26)	0.882	(-0.48)	0.796	(-1.00)	0.948	(-0.22)
受害	0.944	(-0.33)	1.116	(0.47)	1.329	(1.37)	0.820	(-0.86)
教育(高中=0)								
初中及以下	1.595***	(2.74)	1.333	(1.29)	1.254	(1.04)	0.941	(-0.23)
专科及以上	0.693**	(-2.04)	0.510***	(-2.97)	0.827	(-1.02)	0.937	(-0.31)
地区(中部=0)								
北部	0.889	(-0.65)	1.328	(1.08)	1.375	(1.45)	0.734	(-1.27)
南部	0.980	(-0.11)	1.199	(0.67)	1.110	(0.46)	0.916	(-0.35)
东部	0.648	(-1.17)	2.193*	(1.89)	1.339	(0.69)	1.590	(1.16)
世代(60岁以上=0)								
20-25	1.755*	(1.93)	1.108	(0.26)	0.597	(-1.53)	0.970	(-0.08)
26-59	1.490*	(1.66)	1.064	(0.22)	1.003	(0.01)	1.060	(0.21)
性别(男性=0)								
女性	1.093	(0.63)	1.120	(0.61)	1.053	(0.33)	1.014	(0.08)
<i>N</i>	1259		958		933		895	
<i>Log Likelihood</i>	-675.382		-418.588		-509.012		-413.280	
<i>df</i>	17		17		17		17	
<i>AIC</i>	1.101		0.911		1.130		0.964	
<i>Pseudo R</i> ²	0.0760		0.1762		0.1592		0.0842	

说明:同表3。

数据来源:同表1。

(二) 阶级因素中的“利益认知”:“相对得失”vs.“绝对得失”

进一步考察,前述阶级因素如何作用于民众最终的政治态度,或者说,不同阶层民众如何将自身的利益得失归因于两岸经贸交流?以往研究认为,诸如竞争能力、经济区域和产业部门之所以会影响民众两岸经贸态度,是因为民众将自身利益的增减归因于两岸经贸,从而形成对该政策明确的政治态度。由此可知,利益认知——即绝对的获利/受损,是理性因素影响民众最终政治态度的中介机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预期,不同阶层民众,也是通过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认知形成对两岸经贸开放的态度。

因此,本文引入变量“绝对受益程度”检测上述预期。如果不同阶层民众是因为感受到自身利益得失的冲击,进而支持或反对两岸经贸开放,那么在模型中控制绝对受益程度之后,阶级因素对

两岸经贸的影响作用应该消失。否则,则说明阶级因素的影响力可能来自另外的作用机制。

基于问卷的限制,本文只能采用2012年“两岸关系和国家安全民意调查”的数据对此进行检验,观察低阶民众是否因实际利益受损从而反对两岸经贸开放。测量题目为“请问您觉得家里现在的经济状况与一年前相比,是比较好,比较不好,还是差不多?”本文将答案“比较好”“比较不好”“差不多”分别设置一个连续变量和一个类别变量进行检验。连续变量的“绝对受益程度”将上述回答根据受益多少由低到高排序,类别变量“是否受益”按照民众的回答分为三类,以“差不多”为对照组。将上述变量分别放入模型后的Logit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中模型(2)到模型(3)的结果显示:控制民众对受益程度的判断后,低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仍然显著地影响民众的两岸经贸态度。相对于中阶,低阶民众选择管制两岸经贸的立场是选择其他立场的1.462倍[$\exp(0.380)$]。虽然系数有所降低,由原来的0.449变为0.380,但下降幅度较小(15%)。所以低阶民众并非因为绝对意义上的利益受损而反对两岸经贸开放。换言之,绝对受益程度并非阶级因素对政治态度的作用机制。

那么,阶级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基于上述经验考察的结果,本文认为:民众的政治态度/立场不仅仅取决于其对利益的认知和判断,还需要对认知和判断进行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往往与产生评价的“脉络”有关——脉络既涉及个人“之前-之后”的比较,还包括“自己-他人”的比较。因此,上述绝对受益程度是针对自身情况“之前-之后”的比较结果,而对阶级因素,“自己-他人”的比较结果可能才是影响不同阶层人群政治态度的重要机制。毕竟,阶级本身所代表的核心含义反映的是利益分配的结果。因此,阶级因素最终反映到政治态度,其中的关键不在于两岸经贸政策是否造成了该阶层人群绝对意义上的利益得失,而是两岸经贸所带来的利益在不同阶级中的分配是否公平。也就是说,即便不同阶级在两岸经贸中都得到了利益,但是因为所得利益差距太大,对低阶人群而言,造成了一种相对利益损失。相对剥夺感带来的痛感,更容易激发民众对两岸经贸的反感。^[15]因此,阶级因素对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影响,是通过人们对相对利害的认知发挥作用的。

表5 所处阶级、受益程度对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影响的Logit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Exp(β)	S.E.	Exp(β)	S.E.	Exp(β)	S.E.
阶级(中阶=0)						
高阶	1.089	(0.38)	1.036	(0.16)	1.052	(0.22)
低阶	1.567 ^{***}	(2.39)	1.462 ^{***}	(2.00)	1.467 ^{***}	(2.01)
受益程度(连续)			0.580 ^{***}	(-3.59)		
受益程度(差不多=0)						
变好					0.303 [*]	(-1.71)
变差					1.623 ^{***}	(2.96)
“统独”(维持现状=0)						
统一	0.773	(-0.92)	0.659	(-1.39)	0.655	(-1.41)
“独立”	1.713 ^{***}	(2.94)	1.631 ^{***}	(2.65)	1.651 ^{***}	(2.70)
身份(中国人及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0)						
台湾人	1.898 ^{***}	(3.78)	1.821 ^{***}	(3.48)	1.823 ^{***}	(3.48)
省籍(客家人=0)						
闽南人	1.049	(0.20)	1.068	(0.27)	1.084	(0.33)
外省人	0.449 ^{**}	(-2.11)	0.452 ^{**}	(-2.05)	0.460 ^{**}	(-2.00)
政党(无倾向=0)						
泛蓝	0.617 ^{**}	(-2.48)	0.651 ^{**}	(-2.16)	0.649 ^{**}	(-2.18)
泛绿	2.908 ^{***}	(5.71)	2.926 ^{***}	(5.66)	2.909 ^{***}	(5.63)

续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Exp(β)	S.E.	Exp(β)	S.E.	Exp(β)	S.E.
教育(高中=0)						
初中及以下	1.220	(0.92)	1.234	(0.96)	1.234	(0.96)
专科及以上	0.892	(-0.60)	1.019	(0.10)	1.016	(0.08)
地区(中部=0)						
北部	1.371	(1.45)	1.376	(1.45)	1.391	(1.50)
南部	1.111	(0.47)	1.035	(0.15)	1.048	(0.20)
东部	1.230	(0.49)	1.055	(0.12)	1.064	(0.14)
世代(60岁以上=0)						
20-25	0.642	(-1.33)	0.780	(-0.73)	0.770	(-0.76)
26-59	1.149	(0.59)	1.221	(0.83)	1.210	(0.79)
性别(男性=0)						
女性	1.090	(0.53)	1.091	(0.53)	1.085	(0.49)
<i>N</i>	933		928		928	
<i>Log Likelihood</i>	-509.74394		-497.94051		-495.35436	
<i>df</i>	17		18		19	
<i>AIC</i>	1.131		1.110		1.111	
<i>Pseudo R²</i>	0.1580		0.1727		0.1736	

说明: 同表3

数据来源 “两岸关系和国家安全民意调查”(2012年), 主持人: 牛铭实。

五、结论与讨论

两岸经贸整合一直被作为“经济改变政治”的试验场域。^[16]今日的两岸就经贸合作交流而言,已属密切的经济实体。密切的经贸往来,不可能不带来深远的政治影响。那么作为国家统一大业策略之一的两岸经贸能否成功赢得台湾民心呢?^[17]对此,本文通过分析4轮平行的民调数据发现:台湾民众对经贸整合所持态度经历了起伏震荡,两岸经贸整合的进程,远比预期来得复杂困难。

本文发现:一方面,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经贸的立场明显历经两波起伏;另一方面,影响民众两岸经贸立场的因素,也显示出清晰的阶段差异。左右台湾民众立场的力量,早期被认同因素主导,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因素的作用愈发重要。与此同时,本文发现,联结“经贸交流”与“政治立场”的“切身利益”问题,实际非常复杂。第一,台湾民众主要是依据其“认知利害”,而非仅“实际利害”,形成其经贸立场;第二,民众政治立场更多取决于所认知的“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即民众更关切所处的社会位置。如果他们发觉其社会地位日渐低落,将形成一定程度的“公平感受认知”与“自我危机意识”,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政治立场。

从全球化视角来看,上述发现也意味着,对于台湾民众而言,两岸经贸整合既涉及两岸关系的定位,又与经贸开放脱不了关系。就后者而言,对于台湾这样体量较小的经济体,必然深度仰赖对外经贸交流,也难免受各种外来的经贸影响。这类影响往往产生不同的分配后果——既创造出自由贸易的赢家,也制造了经贸开放的输家——自然形成针对“经贸开放与否”的政治争议,即所谓“分配政治”(distribution politics)。^[18]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开放-保护”之争又与“两岸问题”交缠纠葛,典型如前述“太阳花”学运,其《宣言》中便将台湾的分配恶化趋势、弱势群体问题归咎于两岸经贸开放,抗议所谓“跨海峡政商网络”。这样的发展趋势,促成了“经贸问题”与“统独问题”的合流。^[19]上述纠葛正是现阶段两岸经贸问题最重要的特征。

面对政治与经济交缠纠葛的两岸经贸问题,解决之道应该在分开解结。两岸经贸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冲击与争议——如上文所说的“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社会地位升降与预期所引发的不安等——本质上与“统独”问题可以分开对待。两岸经贸整合过程,是台湾“经济全球化”无法避免的部分,与两岸关系本身没有必然联系。问题是大陆恰好是台湾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开放获利与冲击的主要来源,因而不可避免地扮演着“财神爷”与“替罪羊”的角色。如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两岸经贸互动与台湾政治发展,不妨将之视为更广泛的“全球潮流与地方回应互相塑造”的一个案例,若能从这个角度观察,也许两岸经贸与台湾民意的问题,会更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与价值。

注释:

- [1] 人民网《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四点意见》,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219958.html>, 查询时间: 2019年1月3日。
- [2] Peter Alexis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Michael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盛杏媛《“统独”议题与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 一九九〇年代的分析》,《选举研究》(台北)2002年第1期,第41-80页;徐火炎《台湾结、中国结与台湾心、中国情: 台湾选举中的符号政治》,《选举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1页;吴乃德《面包与爱情: 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台湾政治学刊》(台北)2005年第2期,第5-39页;郑夙芬《族群、认同与总统选举投票抉择》,《选举研究》2009年第2期,第23-49页;张传贤、黄纪《政党竞争与台湾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联结》,《台湾政治学刊》2011年第1期,第3-71页。
- [4] 耿曙、陈陆辉《两岸经贸互动与台湾政治版图: 南北区块差异的推手》,《问题与研究》(台北)2003年第6期,第1-27页;耿曙《经济扭转政治? 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响》,《问题与研究》2009年第3期,第1-32页;于强、耿曙、陈曦、李扬《惠台政策对台湾农渔业选民的影响研究: 利益、认同与投票行为》,《台湾研究》2016年第2期,第16-25页。
- [5] Shu Keng, Luhuei Chen & Kuanbo Huang. “Sense, Sensitivity, and Sophistication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2006, Vol. 42(4): 23-66; 陈陆辉、耿曙、王德育《两岸关系与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 认同、利益、威胁与选民投票取向》,《选举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2页。
- [6] 陈陆辉、陈映男、王信贤《经济利益与符号态度: 解析台湾认同的动力》,《东吴政治学报》(台北)2017年第3期,第1-51页。
- [7] 邓利娟、朱兴婷《台湾学运背后的经济发展困境》,《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第44-51页。
- [8] 郑振清《台湾新世代社会运动中的“认同政治”与“阶级政治”》,《台湾研究》2015年第3期,第9-15页; Zheng Zhenqing. “Taiwan’s Wealth Gap and Evolu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after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ian Survey*, 2013, Vol.53(5): 825-853; Qi Dongtao.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ed Resurgence of the DPP during 2008-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013, 216: 1018-1044.
- [9] 邓利娟、马士伟《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两岸贸易收益的量化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6期,第40-50页。
- [10] 陈陆辉、耿曙、涂萍兰、黄冠博《理性自利或感性认同? 影响台湾民众两岸经贸立场因素的分析》,《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期,第87-125页。
- [11] 陈映男、耿曙、陈陆辉《依违于大我、小我之间: 解读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交流的心理纠结》,《台湾政治学刊》2016年第1期(六月号),第1-59页。
- [12] 本文之所以选用两项民调数据,是因为2016年的“两岸关系和国家安全民意调查”问卷删除了与职业有关的问题,导致本文的关键自变量“阶级因素”无法度量。
- [13] 由于篇幅限制,4轮民调主要变量的分布对比并未在本文中展示,读者若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 [14] 由于“阶级因素”与“产业部门”都是根据“职业”来划分的,所以放在同一个模型中会有共线性问题,因此分别放在不同模型中,包含“阶级”的模型结果在表3中,包含“产业部门”的模型结果在表4中。分析时选择含有“阶级因素”的模型。
- [15] 孙云、易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台湾民众社会心态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5期,第1-9页。

- [16] 耿曙《经济扭转政治? 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响》,《问题与研究》2009年第3期,第1-32页; 陈映男、耿曙、陈陆辉《依违于大我、小我之间: 解读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交流的心理纠结》,《台湾政治学刊》2016年第1期(六月号),第1-59页。
- [17] Shu Keng & Emmy Ruihua Lin. “Bidding for Taiwanese Heart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China’s Strategy to Engage Taiwan”, in *New Dynamics in Cross-Taiwan Straits Relations: How Far Can the Rapprochement Go?* Richard Weixing Hu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69-189; Shu Keng, Jean Yuzhen Zeng & Qiang Yu. “The Strengths of China’s Charm Offensiv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a Southern Taiwan Town under Attack from Chinese Economic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2017, No. 232: 956-981.
- [18] 类似的情况请参考 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eter J. Katzenstein. *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O. Keohane & 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eoffrey Garrett.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9] 耿曙、陈陆辉《两岸经贸互动与台湾政治版图: 南北区块差异的推手》,《问题与研究》2003年第6期,第1-27页; 郑振清《分化社会挑战民主政治——台湾政治周期及其经济社会根源》,《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第56-63页; 郑振清、段哲哲、杨子申《政治偏好、经济利益与威慑感知——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民众“九二共识”立场的影响因素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3期,第13-22页。

(责任编辑: 唐 桦)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est Cognition and Political Stand

—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Taiwa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Exchanges (2004—2016)

Chen Wei, Keng Shu

Abstract: It has been a decade since the opening-up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exchanges by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o win the popular will of Taiwan. However, we are wondering what attitude the people of Taiwan hold towards it? Based on the time-series data,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cross-strait business exchanges have experienced dramatic ups and downs from warm expectations earlier to uneasy doubts in the mid-term, and then to the recent friendly welcome. Then, what has led to the great change in their attitu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trade pattern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aiwan? In order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four rounds of parallel polls in Taiwan (2004, 2008, 2012 and 2016)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stage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attitudes, that is, before and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xchanges, identity factors dominated their business attitudes, while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exchang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lass factors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response of the lower class to the exchanges tends to be stronger and their stand clearer because of the poor bearing capability and a strong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key elements concerning the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aiwan people are not the objective interests, but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which influence their policy stance.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tracks how Taiwan politics changed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class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clarifies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by taking the cross-strait business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cross-strait relations, class politics, identity politics, interest cognition